

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黄美真 姜义华 石源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金元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黄美真 姜义华 石源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27,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书号 11074·586 定价(六) 0.52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一、汪伪“七十六号”的登场

(一)日本侵华政策的产儿·····	4
李士群的出场·····	4
大西路六十七号·····	7
丁默邨应邀而来·····	13
日本大本营的特殊“训令”·····	15
特工队伍的初步形成·····	21
(二)与汪精卫集团合流·····	25
汪精卫逃出重庆·····	25
汪曼云充当牵线人·····	29
与汪精卫集团合流·····	34
(三)“七十六号”正式开张·····	37
门禁森严的大魔窟·····	37
拖人下水的三部曲·····	41
汪记国民党“六大”·····	44
组织机构的膨胀·····	47

二、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的活动

(四)袭击报馆，戕害爱国报人·····	52
沦陷后的上海新闻界·····	52

2R14/10

袭击《中美日报》社	55
血染《大美晚报》社	56
(五)残杀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	61
枪杀共产党人茅丽英	61
绑票勒索富商方液仙	64
染指烟、赌、毒	67
(六)争夺租界警权与法院管辖权	71
沪西“越界筑路”警权之争	71
“租界突击队”	76
签订《警务临时协定》	79
争夺租界法院管辖权	80
(七)与蒋方特工的争斗	84
先拿詹森开刀	84
一次刺汪密谋的流产	86
“青岛会议”期间的一场特工战	90
“兆丰总会”枪击案	92
夺取蒋方特工组织	95
(八)银行血案	100
“中储券”的推行	100
骇人听闻的大血案	102
杜月笙“调停”	106

三、汪伪特工总部的派系斗争

(九)丁、李冲突	109
矛盾之由来	109
“永不起用”唐惠民	110

张小通之死·····	113
“郑蘋如间谍案”·····	115
争夺“警政部长”·····	118
(十)“清乡”中李士群势力的扩展·····	122
抓到“清乡”大权·····	122
取代伪江苏省主席·····	125
染指浙江碰了壁·····	129
“清乡”干部学校·····	131

四、汪伪特工总部的覆没

(十一)吴四宝之死·····	137
猖狂的暴发户·····	137
“太岁”头上动土·····	141
吴四宝被毒毙·····	144
(十二)李士群的下场·····	146
一条被遗弃的走狗·····	146
四面楚歌·····	153
步吴四宝的后尘·····	161
(十三)特工总部的末路·····	166
“灵前会议”·····	166
黄自强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168
陈公博自兼“总监”·····	172
蒋伪合流的丑剧·····	173
群奸末日·····	176

附录:

一、汪伪“七十六号”特工组织系统表	180
二、汪伪警政部与特工总部关系表	182
三、汪伪调查统计部与特工总部关系表	183
四、上海部分新旧路名对照表	184
五、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简图	186
后记	187

一、汪伪“七十六号”的登场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只要提起沪西“歹土”——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今万航渡路四三五号)，不少人就要噤若寒蝉。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所在地，这里成了罪恶的渊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它追随日本侵略者，甘当鹰犬，破坏抗战，残害人民，干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危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但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尚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日军未能直接控制，形成了所谓“孤岛”。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占领后，便把它作为进行政治诱降、扶植汉奸傀儡的主要活动据点。国难当头，沉渣泛起。许多游荡在上海滩上的社会渣滓、政治上不得势的民族败类，在日本侵略者的招降幡下，先后落水。对于日军的侵略行径以及汉奸的卖国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孤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切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们，也无不同声谴责；国民党在沪特务机关，则通过恐怖活动处置了一些汉奸。日本侵略者为了扫清侵华道路上的障碍，决心建立一支汉奸特工队伍，作为扑灭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李士群的特工势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日本侵略者所一手扶植、膨胀起

来。

汪伪特工总部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特工总部的萌芽阶段。一九三八年秋冬，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邨先后从国统区潜赴上海投敌。由于他们过去都曾在上海从事过特务活动，情况熟悉，与国民党留沪特工人员也有一定的历史关系，因此他们的“归顺”，深受日本侵略者的欢迎。但由于人少力薄，既无组织名称，也无组织机构，只是在日本驻沪大使馆的指挥下，利用过去的老关系，从事情报活动。

第二阶段，是特工总部的初步形成阶段。李士群、丁默邨这两个具有政治野心的职业特务，是为了出人头地，才来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因此决不满足于充当情报员的小角色；当他们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赏识，并有了几个喽罗之后，就提出要建立特工组织，以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们通过日本大使馆的引荐，拜会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经由土肥原介绍，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获得日本大本营的支持，转归日本军方指挥。在日军金钱、武器、弹药的豢养下，他们初步组成了一支武装特工队伍，活动范围也从搜集情报扩大到从事恐怖行动。为了壮大声势，他们还主动派人去香港，与汪精卫集团联系，谋求特务活动与汪精卫集团的汉奸政治活动合流。这个时期，李士群、丁默邨的特工队伍，虽然还没有正式名称，但已略具规模，并正式建立了组织机构。

第三阶段，是特工总部的最后形成阶段。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卫从河内潜赴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筹组伪中央政权。为了保障汪精卫等人的安全，扩大汪精卫所谓“和平运动”的声势，日本侵略者决定让李士群、丁默邨的特工队

伍与汪精卫集团合流。经过汪伪国民党“六大”，李、丁的汉奸特务组织，就正式挂上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的招牌。到一九四〇年三月汪伪政权成立时，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庞大的特务机构了。

这部分所要介绍的，就是汪伪特工总部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 日本侵华政策的产儿

李士群的出场

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七十六号”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是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特务李士群。日本侵略者看中李士群决不是偶然的。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日。早年丧父，与胞妹依靠母亲种田为生，家境并不富裕。幼年在家乡私塾读过几年书，二十年代初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生活来源主要仰给他的妻子、复旦大学学生叶吉卿。这时期，李士群由于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李士群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不久，李士群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为了避免工部局将他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清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名瑞庭，无锡人)的门路，由季通过巡捕房里的熟人，将他保释出

① 对于李士群是否去过苏联留学有两种说法。敌伪时期，不少认识李士群的人都说，他曾去苏联留学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李士群死后，汪精卫在为他所写的《墓碑铭》中，也说他留学过苏联东方大学。但李士群青年时代的老友马世谔否认他留苏之说，认为这是他为抬高自己的身份而自吹出来的，因而以讹传讹。我们认为，李士群确去莫斯科留学过。

来。后来，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他与上海流氓帮会势力拉上了关系。

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①的特务，以上海为重点，活动非常猖獗，共产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②一九三二年，李士群被“调查科”逮捕。他眼见地下斗争处境艰难，贪生怕死，很快自首叛变。起初，他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又与丁默邨、唐惠民等，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春坊新光书局编辑《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是由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一派“C·C”特务直接控制的，用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的手法，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挑拨离间之能事，是当时国内有名的“造谣”刊物。

一九三三年春的一天晚上，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牌吃花酒，折腾至半夜。当他喝得醉眼朦胧，在丁默邨的陪同下，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遭到共产党中央特科“红队”^②的

①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的蒋介石、陈果夫，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任科长，专门收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一九三〇年，“调查科”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设特工总部，建立了特工队伍，并在各省、市、县和特别党部中，陆续建立了下属机构特务室（小县只有特务员），在重要地方还设立了秘密工作区，如上海区、南京实验区、徐蚌工作区等。一九三四年，“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同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调查统计局”，以军方贺耀组为局长，党方陈立夫为副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是党务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第三处是邮电检查处，处长丁默邨。一九三八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第三处撤销，另建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由第二处处长戴笠升任局长，简称为“军统”。

② “红队”是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组织的一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武装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叛徒特务，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伏击，立即毙命。南京“调查科”电令上海区限期破案。不久，丁默邨、李士群作为重大嫌疑犯，一并被捕。丁默邨因地位较高，由他的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留押在上海，后又由吴保释；李士群则因为没有靠山，被解押到南京道署街（后改名瞻园路）“调查科”总部。经“调查科”特务组刑审后，关押在走马巷南京区侦行股办事处。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与李士群同在“调查科”上海区当情报员，她带了大批珠宝，在上海区侦行股长陪同下，赶到南京营救。她到处送礼，层层贿赂，走通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于是由徐下了一纸手谕，不再追查。李虽被释放，但仍然被规定不得擅自离南京。不久，李士群被指派为“调查科”编译股编译员、南京区侦查员。一九三三年底开始，李士群担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①理事。从此，他郁郁不得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一九三七年底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政府、党部撤离南京，李士群与特务石林森、夏仲高奉命“潜伏”，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七十六号。三人雇用了两个女佣，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不久，李士群就和其中的一个勾搭上了，后来两人一起跑到汉口。这个“女佣”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特务。在她的引诱下，李士群终于下决心改换门庭，投靠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李士群让这个“女佣”先赴香港，为自己的出逃作先行。同年夏秋之交，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调任他职，“中统”改派李士群继任。李士群

① “留俄同学会”成立于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是国民党借以拉拢留俄学生，进行反苏反共等活动的组织。会址设在南京山西路颐和路口，并在山西路西流湾附近办了一个“留俄杂志社”。

在领到特务费用后，就吞没了这笔款子，避开“中统”在广州一带布置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李士群到达香港后，在“女佣”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难以发挥作用，便把他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大西路六十七号

李士群到上海后，在清水董三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为日本驻沪使馆从事情报活动。

李士群在上海的住所是大西路六十七号（今延安西路665号）的一幢洋房。他选中这幢房子，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刚到上海时，日本主子对他还不完全信任，连一支破枪也没给他，这使他感到自身的安全缺乏保障。当时的上海虽已沦陷，但租界还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统治下，人们把这个时期的租界称为“孤岛”，生活在“孤岛”上的中国人民，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汉奸走狗一时还不敢在租界上公开活动。另一方面，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对汉奸、奸商和妥协分子，采用暗杀、绑架手段，制造了不少血案。而日本侵略者采取“以牙还牙”的手段，指使一个绰号叫“江北杜月笙”的清帮流氓常玉清^①，组织了流氓特务组织“黄道会”，同国民党特务

① 常玉清是一个老牌汉奸。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纠集一批汉奸，组织“闸北地方维持会”，帮助日军。日军占领上海后，常玉清再次投靠日本侵略者，纠集一批亡命之徒，在虹口新亚酒店内成立“安清总会”，并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在总会下成立一个叫“黄道会”的流氓特务组织，从事破坏抗日的恐怖活动。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常玉清遇刺毙命。

对抗，使上海的恐怖事件愈演愈烈。上海沦陷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双方你来我往，恐怖事件达几十起；不少人刚与日方勾结，就被暗杀，其中较有名的如唐绍仪^①、陆伯鸿^②、周凤岐^③、余大雄^④等。在这种形势下，李士群为了在上海站住脚，不得不步步小心，谨慎行事。

大西路六十七号，是一个理想的活动基地。这幢房子的对面，是“云飞”汽车行数十米长的围墙。在墙边的人行道上，刺客难以隐蔽躲藏。西邻六十九号，住的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也可不必顾虑。更主要的是，东邻六十五号，是美国军队驻沪兵营，门前日夜有武装守卫。李士群认为，蒋介石的特务是决不敢为了一个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的。在房子里，李士群也作了精心的布置。他在沿马路的楼梯转角处，设

-
- ①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中山县人。清末曾任外务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一九一二年，任中华民国内阁第一任总理，不久与袁世凯发生矛盾，愤而辞职。一九一七年九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任财政部长，后又为七总裁之一。一九三一年冬起，唐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与蒋介石关系不好。抗战爆发后，寓居上海，与汉奸温宗尧交往甚密。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家中被“军统”特务暗杀。
- ② 日军占领上海后，拉拢一批所谓“绅商闻人”，打着“救济难民”、“恢复生产”的幌子，成立“上海市民协会”。这是日本侵略者准备在租界内成立伪政权的一个步骤。陆伯鸿是“上海市民协会”的重要角色。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当他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寓所外出时，被一个伪装成水果小贩的国民党特务打死。
- ③ 周凤岐，原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浙江军阀，先后任卢永祥、孙传芳部师长。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进入浙江后，周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周部驻扎于闸北宝山路一带，充当了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投降日本侵略者，拟出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周凤岐在自己的寓所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门口遇刺丧命。
- ④ 余大雄，早年留学日本，是当时上海比较活跃的文化汉奸，为“军统”特务新毙于伪维新政府的大本营——虹口新亚酒店的浴缸之中。

立了一个瞭望哨，由他当时的保镖张鲁日夜站在那里警戒。这个张鲁，后来深得李士群重用，任“特工总部”直属警卫大队长，得过“少将”军衔。另外，李士群还把面向马路的车库大门，从早到晚敞开，停放着自己的汽车。他本人外出，则临时雇车，从不坐自己的车子，使人对他的行踪无法捉摸。到过六十七号的人，常常可以听到李士群自鸣得意的吹嘘：“人家坐的是保险汽车，我住的是保险房子。”

李士群虽然住进了“保险房子”，但觉得单凭这幢房子的环境，对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开展情报活动，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开始把手伸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等机构，一是拉人入伙，二是企图与某些要人达成谅解。这样，既有利于搞到重要的情报，又可使自己的安全进一步得到保证。他首先用钱将三十年代初期一同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的同伙、当时任“中统”上海区情报员的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刘坦公等拉下水，和他一起成为清水董三的情报人员。

不久，李士群通过章正范的关系，又秘密会见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汪是大流氓杜月笙的“学生”，与“军统”、“中统”特务都有联系，在上海滩上是属于“兜得转”的人物。李士群认为，如能和他搭上关系，将十分有利于自己的安全与活动。而汪曼云之所以乐意与李士群见面，也自有一番打算。汪认为，租界已成“孤岛”，美、英等帝国主义者对日本处处退让，日本宪兵队在租界内捕人，虽需通过一些规定的手续，但却为所欲为，如有了李士群这条通向日本人的路子，就可为自己留条退路。两人一见面，李士群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投奔日本人，是因为过去‘中统’对我手段太辣，要借此报复

一下，出出气；同时，也因为太穷，想在日本人那里骗上二十万元，然后滑脚溜走，并不想长干，希望老兄能了解我的苦衷，如有对我不谅解的人，请代为解释，能照应的地方，望多多照应。”汪曼云见李士群如此“坦率”，当即全部答应了李的要求，并也直言不讳地向李提出：“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住，老兄将何以善我后？”李即刻表示：“简单得很，只要说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有联系就行了。”^①就这样，双方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从此，李士群、汪曼云、章正范之间，不时有些酬酢往来。

设法与杜月笙建立联系，取得杜月笙的谅解以至支持，是李士群在大西路六十七号这段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杜月笙，上海浦东高桥人，生于一八八八年，以贩卖鸦片、开设赌场起家，后来成为上海清帮流氓大头子之一，在上海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广收门徒，结交权贵。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共进会”，驱使大批门徒，充当镇压革命的打手。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先后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②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等职。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的第三天——八月十五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叩蒋介石之命来上海组织“别动队”，杜月笙与戴笠是把兄弟，于是给予全力支持，在“别动队”的五个支队长中，三个由他的门徒担任。九月上旬，蒋介石电令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

① 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② 公董局是上海法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公董局公董起初全由法国人担任。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改选时，法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规定在十七名公董中，可有五名中国人。他们被称为华董。杜月笙是一九二九年七月当选为法租界公董局华董的。

委员会”，颁发“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改名为忠义救国军）”番号，杜月笙是“行动委员会”的三个常委之一，可以指挥上海部分“军统”特务和苏南地区部分“忠义救国军”的行动。上海沦陷后半个月，杜月笙秘密乘法轮“阿拉密司”号去香港。杜月笙人虽去香港，但在上海滩上仍留下很大的势力。李士群深知杜月笙的力量，于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企图与杜月笙搭上关系。

一天，清水董三转发给李士群一份材料，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这份材料是由杜月笙一手扶植起来的法租界纳税华人会^①秘书张师石写的。它详细记载了杜月笙的出身、经历，杜月笙与法租界的烟赌业、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及与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等人的关系，列述了杜月笙手下小八股党、得意门生、贴身亲信等一批人的情况，并特别详述了杜月笙和戴笠的特殊关系。李士群拿到这份材料后，如获至宝，认为这是“天假其缘”，与杜月笙建立联系是没有困难了。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汪曼云，约他前来会晤。当时，李士群为了避人耳目，白天总是不敢离开住所，要见面的人，都由他打电话约到“六十七号”来。汪曼云接到电话后，又去约了章正范，因为汪这时也不敢只身到李士群那里去，怕“事有万一”。

汪曼云与章正范到了“六十七号”，李士群一见面便装作气愤地说：“汪兄，我因激于义愤，才把你请来的。我觉得张师石太没有良心，老杜（指杜月笙）待他不错，他却把老杜出卖了。你看，这份东西就是他写给日本人的。”说着便把手里那

^① 纳税华人会是当时法租界内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它的前身是法租界商业总联合会。